

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破局研究

何玉吉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031; 3422865861@qq.com)

摘 要: 为总结区域非营利组织高质量发展典范并且为国家社会福利事业持续进步贡献策略, 本文基于 2010 年至 2022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非营利组织发展数据, 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法方法, 探究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呈稳步增长态势及集中散点式的分布特征。在时间纬度上, 以 2014 和 2017 为时间节点, 非营利组织发展呈三个阶段。在空间维度上, 非营利组织整体聚集于向长三角地带中上游地区扩展。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发展势头良好, 但在区域内发展差距较大, 部分地区供给矛盾突出, 在推动非营利组织均衡发展和监管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 非营利组织; 时空演变

引言

非营利组织是实现社会治理和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社会、文化、教育、科学、宗教或慈善目标的组织。近年来, 国家持续重点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我国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范畴列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目标。2024 年 5 月民政部发布《第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重点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格局, 为我国非盈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前进方向。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占有人口和经济总量四成以上的地区, 研究其非营利组织发展对于促进社会治理、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1]。

1 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主要在关注非营利组织在当前社会中能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发挥社会组织效力方面, 众多学者尤其关注在后疫情时代非营利组织面对经济下行时正向溢出效应持肯定态度。学术界近年来在以下两个方面对非营利组织展开了系列研究:

一是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互动。地方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根据毛佩瑾的研究, 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提升了新质生产力, 也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深刻地影响了这些组织的运作和未来发展。张雪和纪晓岚指出, 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并非孤立无援, 而是深深植根于政府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中[3]。尽管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至关重要, 但政府还需要考虑到非营利组织的特性进行区域内协同治理, 从而促进整体范围的社会发展。

二是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在社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 传统管理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 特别是在某些特定领域, 治理上的空缺开始显现。在这种情境下, 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填补这些治理空缺的重要角色。宋道雷年的研究中提到, 在疫情的冲击下, 社会组织能够整合政府、市场、民间力量以及志愿者等多元化资源, 构建起一种协同治理的模式, 从而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空缺问题[4]。与此同时, 陈友华和詹国辉在研究中强调, 尽管中国社会组织在疫情期间面临诸如政策支持不足和自我维持能力不强等挑战, 但它们

在应对危机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与政府的紧密合作，获得了必要的援助和资源，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5]。

综上，学界聚焦非营利组织历史发展逻辑和与政府良性互动，对发挥社会组织活力，建立全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有益的见解。然而，一方面当前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关于非营利组织如何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适应和转型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当前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层面，而对区域特别是标杆区域的深入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关于这些区域的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的探讨。长江经济带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包含生态保护区、文化交流传播区、东西部协作发展区等关键区域，其发展往往需要跨区域、跨省的合作，因此培育长江经济带的非营利组织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背景，本文以长江经济带的 1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选取 2010 至 2022 年间的非营利组织数据，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深入探讨非营利组织的时空演变及其发展策略。本研究旨在为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进而为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进步提供新的思路。

2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关键区域，涵盖 11 个省份和直辖市，地域广表达 205 万平方千米，其人口规模和经济总产值均占全国比重的四成以上。促进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大发展有助于汇聚民间智慧与资源，投身环保宣传、助困帮扶，为经济带治理添砖加瓦，助力打造多元共治、活力满满的发展格局[6]。

2.2 数据来源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指标。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非营利组织数据库（CNGO），该数据库收集了 2010 至 2022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非营利组织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成立时间、详细地址以及主管部门等。通过对这些地址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各省市非营利组织的具体数量。之后利用阿里规划云平台爬取的非营利组织兴趣点数据，结合矢量地图后导入 ArcGIS 10.8 软件，进行非营利组织的时空分布研究。

2.3 研究方法

2.3.1 核密度分析法

Kernel 密度估计是一种基于非参数统计的分析技术，它用于推断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其通过在每个数据点周围放置一系列平滑的核函数（如高斯核），并累加这些核函数的值来构建概率密度的估计值。此方法不需要事先假设数据的分布形式，能够灵活地捕捉数据的局部特征，广泛应用于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领域，因此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时空分析[7]。

$$f_h(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1)$$

2.3.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一种在二维空间中表示数据分布特征的图形工具，它以数据点的均值为中心，沿主成分分析确定的主轴和次轴方向绘制。椭圆的长短轴长度分别对应数据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标准差，直观展示了数据的离散程度和方向性。这种椭圆常用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多变量数据分析中，帮助理解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异性[8]。

3 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时空演变特征

3.1 时间演变特征

3.1.1 第一阶段（2010-2014 年）：稳步增长阶段

从 2010 年至 2014 年，非营利组织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每年注册登记数量均在 150 个以上。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策的指导和推动，2011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 年)》、2014 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激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实施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以减轻慈善活动的财务负担，以及增强社会各界对慈善活动的支持力度。在此阶段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集中出现在各个领域。然而非营利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在日常运营中面临“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陷阱，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亟待解决的[9]。

3.1.2 第二阶段（2014-2017 年）：快速增长阶段

2014 年至 2017 年是非营利组织数量的高峰期，数量维持在约 340 个，2016 年和 2017 年达到最高点。这一阶段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前一阶段政策的持续效应，以及社会对非营利组织服务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在这一时期，非营利组织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资源和资金在这一时期集中流向非营利组织，支持其运营和发展。面对在发展初期阶段所面临的众多挑战，国务院在 2016 年发布了《关于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确保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从而加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10]。

3.1.3 第三阶段：（2017 年-2022 年）：增长停滞阶段

从 2019 年开始，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开始显著下降，到 2022 年降至最低点（见图 1）。这一阶段的下降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政策变化是导致非营利组织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策上的调整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其次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导致资金减少，影响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尤其是 2020 年全球疫情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和资金筹集造成了重大影响，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受限、资金筹集困难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非营利组织的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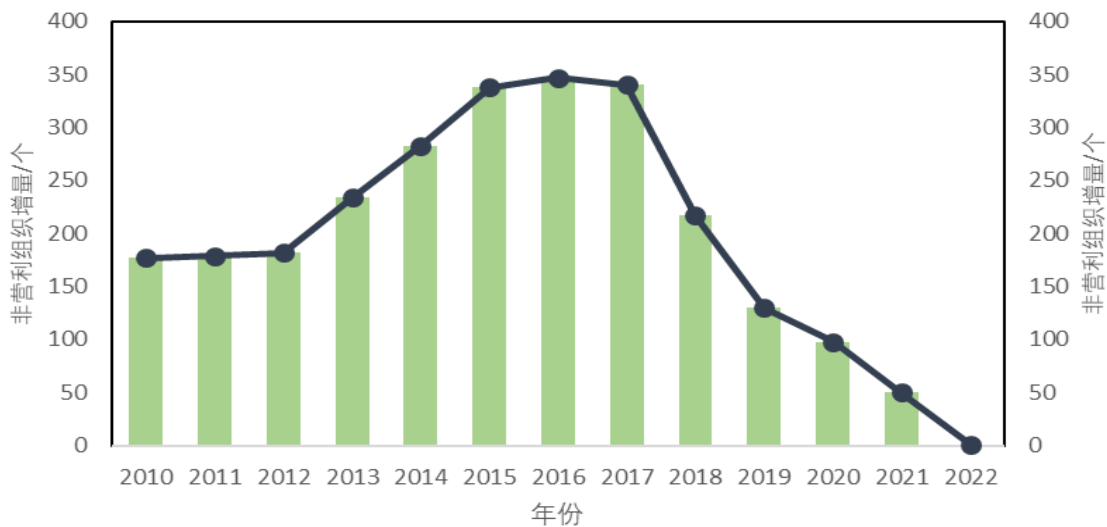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22 年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增长数量

在对比长江经济带区域划分得出，中下游非营利组织注册数量自 2010 年来均呈增长趋势，增长数量及速度满足“下游>中游>上游”特征。如表 1 和图 2 所示：

（1）上游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注册数量在三个区域中最低。其中四川（157 个）、云南（108 个）、重庆（81 个）、贵州（52 个），四川居于榜首，在上游四省中四川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成渝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强，为非营利组织的成立提供了适宜的环境。（2）中游地区增长速度适中，注册数量处于中游水平且稳步上升。截止 2022 年，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非营利组织注册数量分别为 172 个、108 个和 58 个。（3）相较于上中游，下游地区增长速度显著，其数量在大部分年份均同时期高于中游和上游。浙江（378 个）最多，江苏（350 个）次之、上海（309 个）安徽（93 个）较少，下游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公益意识强，政策支持力度大，因而推动非营利组织迅猛发展。同时由于大部分跨区域组织因成员招募、公益收入等考量，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的城市注册较多。

表 1 2010-2022 年各区域非营利组织数量

区域	下游				中游			上游			
省份	浙江	江苏	上海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四川	云南	重庆	贵州
数量	378	350	309	93	172	108	58	89	78	60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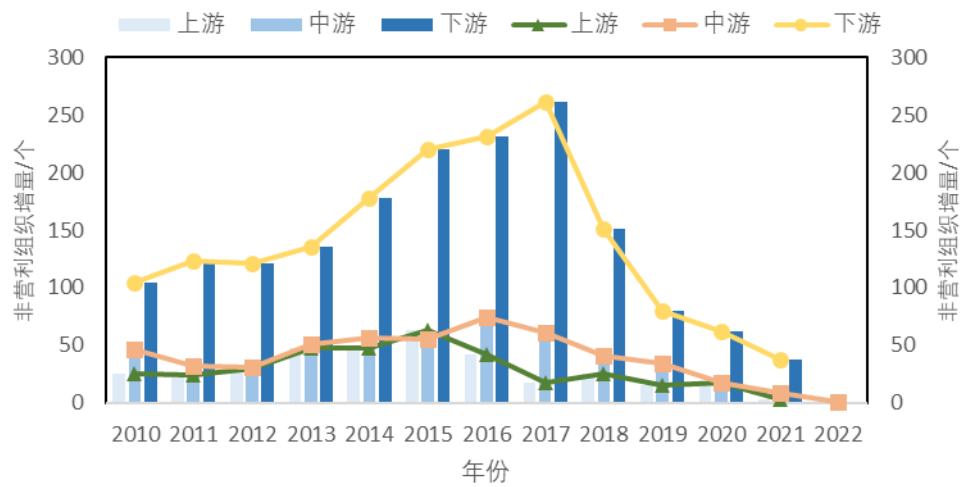


图 2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增长对比

3.2 空间演变特征

3.2.1 聚集性演变

基于核密度分析依次报告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非营利组织注册数量的动态分布。非营利组织呈现分散集中的散点式特征，主要聚集在上游的四川、云南，中游的湖南，下游的上海、江苏等省（市）。其中上游主要集中在成都和昆明，中游在长沙和武汉，下游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高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全境的长三角中心地带（见图 3）。

通过空间相关数据得出，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主要以高-高（H-H）、低-低（L-L）聚集现象分布。（1）H-H 型高聚值类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得益于该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居民较强的经济能力，这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该地区人口密集、老龄化趋势明显，加之外来人口众多，导致对非营利组织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此外，该地区聚集了大量高校，教育的发展也为这些组织带来了专业人才和志愿者资源。

（2）L-L 型低聚值类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省、重庆市。两省在非营利组织发展方面对比其他省域相对滞后，与其地理位置偏僻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关。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不仅催生了对公共服务和多样化服务需求的显著增长，也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广阔的服务空间。伴随经济与时代的发展，云

南省的少部分区域也出现了 L-L 型集聚，可能是受到了成渝城市群非营利组织聚类地区的带动影响，促使省内其他地区也开始投入非营利组织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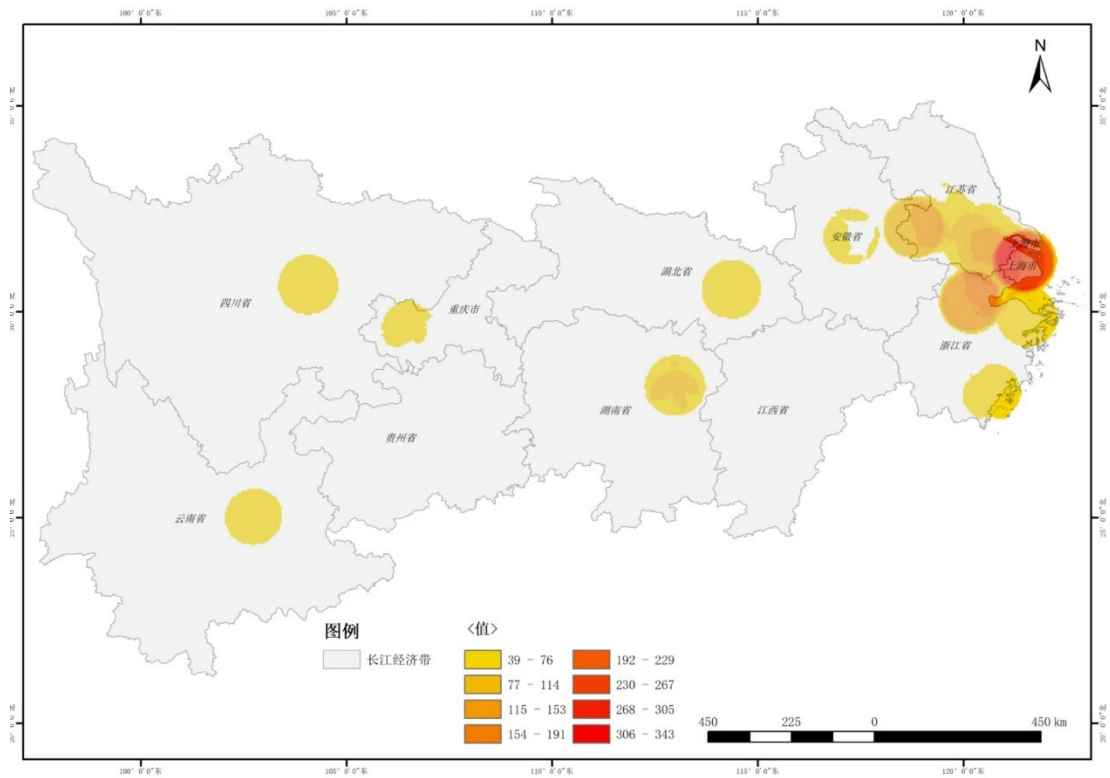


图 3 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核密度分布

3.2.2 分布重心特征

标准差椭圆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精确测量地理现象分布的变异性，并且为分析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和延展性提供了定量的数据支持。借助 ArcGIS 10.8 软件构建 2010—2022 年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差椭圆图像，深入研究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时空演变特征。其中中心点是核心定位标识，它代表着地理要素分布的重心位置，反映数据在平面上的集中趋向。扁度是反映地理要素分布的指向性强度。方位角确定椭圆长轴的指向，大小从 0° 到 360° 变化，精准揭示要素分布的主导方向[11]。

表 2 展示了 2010—2022 年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标准化椭圆均值中心坐标、扁度、方位角等具体数据。

(1) 椭圆均值中心变动。椭圆均值中心由 2010 年的安徽省芜湖市 118.6048° E, 31.1402° N 变化到 2022 年的浙江省台州市 114.6138° E, 29.52711° N，总体上均值中心变化不大，但是其波动性强。从经度上均值中心由 107.0009° E 最大变化到 121.5111° E，横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在维度上总体变化不大，且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演变速度。主要原因是长江经济带跨纬度范围较小，纵向上延展度不高。椭圆均值中心的波动性大，在地理层面上扩展到云南、四川、重庆等省市，尤其在 2017 年后均值中心稳定在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反映出上中游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人民需求的增长刺激了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相对数量增多。

(2) 椭圆方向角变动。在非营利组织的前进轨迹中，虽然其主要发展路径依然指向东北方向，但这种趋势的强度有所下降，同时西北方向的变动趋势开始显现。具体来说，2010 年和 2022 年的椭圆方向角分别为 55.74° 和 51.23°，均指向东北，但方向角的减少表明东北方向的主要发展动力与次要方向的发展动力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通过分析均值中心的位移、椭圆的扁平度变化以及椭圆覆盖的面积，可以推断出非营利组织的空间发展格局正在经历显著的转变[12]。特别是西北方向上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势头逐渐增强，从过去以东北

方向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为多方向均衡发展。此外，上游地区椭圆覆盖面积的持续增长也表明，中上游地区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势头稳健，其分布和发展趋于更加均衡[13]。

表 2 2010-2022 年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标准差椭圆具体数据

年份	位置	经度 (E)	纬度(N)	扁度	方位角
2010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	118.6048	31.1402	0.410379	82.28572
2011	上海市黄浦区	120.1595	31.15118	1.652072	113.0682
2012	上海市浦东新区	118.0957	31.07245	0.018076	87.02871
2013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116.3836	30.64216	2.418252	87.05603
2014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121.5111	31.22592	0.030268	78.61146
2015	上海市松江区	120.0429	30.92048	0.05179	51.23614
2016	上海市普陀区	116.3664	30.87713	0.899096	55.74514
2017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107.0009	27.60297	1.946398	70.32228
2018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117.4311	30.41186	1.054306	72.64153
2019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114.001	28.69016	0.240468	82.5027
2020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	121.4068	28.86637	0.03299	40.24501
2021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	114.6661	29.80887	0.338196	48.36765
2022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114.6138	29.52711	0.425434	68.14102

4 讨论

在社会治理领域非营利组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社会援助和提升社会福利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并迈入了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但贫富差距依然显著[14]。此外，由于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因素，一些刚刚脱贫的家庭面临着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这使得非营利组织的介入变得至关重要。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交融以及东西部合作的关键区域，其发展同样需要非营利组织的积极参与[15]。本项研究运用地理学方法，对 2010 年至 2022 年间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的时空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非营利组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下游地区发展最为成熟，中游地区紧随其后，且分布相对均衡，而上游地区则相对滞后。这一发现与我国当前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相吻合。加强长江经济带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对于促进跨区域、跨省的公共事业投资、推动地区社会福利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构建新的治理结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6]。

5 结论和建议

本项研究基于 2010 至 2022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非营利组织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法等研究方法，对非营利组织的时空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其一，在时间演变维度上，长江经济带的非营利组织整体上显示出扩张的趋势。具体来看，2014 年和 2017 年是两个关键节点，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稳定增长期、快速增长期和增长放缓期。在稳定增长期，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社会需求的增加，非营利组织的数量稳步上升。进入快速增长期，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和运营模式的成熟化，吸引了更多的非营利组织加入，同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规范这些组织的发展。然而，在增长放缓期，受到经济下行和全球疫情的影响，非营利组织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其二，从空间演变维度上，2010 年至 2022 年间长江经济带的非营利组织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散点分布模式。发展整体上看，早期这些组织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江苏、上海和浙江等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得益于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非营利组织开始向西部地区扩展,特别是在2017年,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差椭圆面积扩展到了云南、四川和重庆等省份。从分区域视角来看,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不断增长,地理分布中心逐渐从长三角地区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打破了单一省份主导的局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和进步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理应果断出台系列政策,借助资金补贴、场地支持等激励手段,为非营利组织“输血”“赋能”,塑造良好市场生态。与此同时,制定严格监管政策,规范资金流向、运作流程,让账目清晰、过程公开,驱散大众疑虑,提升公信力,助力社会福利跃升。

第二,政府应继续巩固长江下游地区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优势,并加强对上游省份的支持,以实现长江经济带内非营利组织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环境保护和共同富裕的需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非营利组织承担起社会责任。此外,鼓励不同区域和省份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汪龙鑫,陈杲然.近二十年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研究综述与展望[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4:1-13[2025-03-1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513.S.20241212.1308.014.html.
- [2] 毛佩瑾.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成效、特征与创新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4(5):163-172.
- [3] 张雪,纪晓岚.结构性引导:民办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关系新释[J].北京社会科学,2023(10):107-116.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231010.
- [4] 宋道雷.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有为社会: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4(2):177-184.
- [5] 陈友华,詹国辉.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问题与抉择[J].新视野,2020(5):73-80.
- [6] 王波,何寿奎,马维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类PPP投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J].软科学,2024,38(1):45-52.
DOI:10.13956/j.ss.1001-8409.2024.01.07.
- [7] 胡静轩,彭菲,努尔买买江·库来西,等.长江经济带康养旅游示范基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59(3):62-70. DOI:10.16783/j.cnki.nwnuz.2023.03.008.
- [8] 张岚岚,孙建伟,邓玲玲,等.中国传统村落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J].水土保持研究,2025,32(2):321-330.
DOI:10.13869/j.cnki.rswc.2025.02.030.
- [9] 王姝楠.我国公募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J].行政管理改革,2024(8):61-71.
DOI:10.14150/j.cnki.1674-7453.2024.08.004.
- [10] 韩小凤.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共性困境及优化路径[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6):133-140.
DOI:10.20004/j.cnki.ujn.2024.06.012.
- [11] 蔡晓晶,石蓉丹,肖化顺,等.基于点模式法的湖南省林火时空分布特征[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24,44(7):29-35+76.
DOI:10.14067/j.cnki.1673-923x.2024.07.004.
- [12] 尚俊,蔡海生,龙月,等.基于InVEST模型的鄱阳湖区生境质量时空演化及其变迁特征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30(8):1901-1915.
- [13] 王磊.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及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成都市J区的分析[J].东岳论丛,2024,45(8):159-165.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4.08.019.
- [14] 孙柏瑛,汪元.打破“推定”:政府—非营利组织互动何以优化提升——基于信号理论的路径建议[J].新视野,2023(4):89-96.
- [15] 马庆钰,张蕾.政府如何助力非营利组织国际化发展——基于五个国家样本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10):109-117.
DOI:10.19735/j.issn.1006-0863.2022.10.12.
- [16] 苏航.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的行动逻辑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9.
DOI:10.27150/d.cnki.ghdzc.2019.000253.